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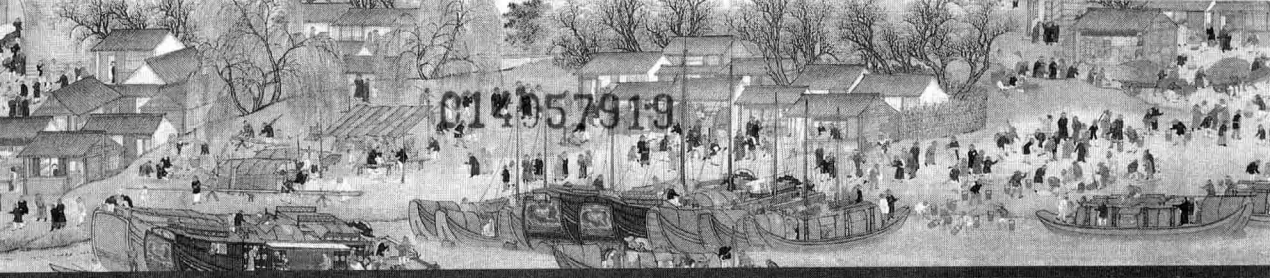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晚清报刊与小说 传播研究

► 李九华 / 著 ◀

WANQING BAOKAN YU XIAOSHUO
CHUANBO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晚清报刊与小说 传播研究

李九华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报刊与小说传播研究/李九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61-4268-4

I. ①晚… II. ①李… III. ①古典小说—传播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7.419②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89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张 剑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n.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晚清文学报刊与近代回族报刊比较研究”（11NXBZW01）的成果

2012年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近代回族报刊文学研究”（13XZW015）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虽然晚清小说概念的提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但实际上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已逾百年，从晚清直至今天，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在晚清小说丰富的矿藏中开掘，以期揭示这个产生于特殊时代的独特文学样式的本质和规律，并陆续有了实质的收获。纵观前人关于晚清小说的著述，我们可以发现，书目整理、文本阐释、文化研究等领域成果颇丰，然对小说的传播及其因传播发生的变化研究不多。晚清恰好是我国报刊业的发生发展时期，晚清小说的载体当时发生了较大规模转移，小说因报刊的传播发生的变化是复杂且细碎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当前，基于传播学的研究仍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尚有余地。

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小说家”类（虽然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小说）至今，经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涉及小说文献目录和研究资料的汇编类著作已十分丰富，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随着小说创作、翻译的持续繁荣，文言和通俗小说的目录整理日臻完善，从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到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对晚清小说的统计从几十种、上千种到近两万种，信息逐渐全面。阿英、胡适、鲁迅以及当代众多学者的研究，取得了非常珍贵的成果。尤其是几位学者对近代报刊小说资料的全面整理，为我们揭开了淹没在近代报刊海洋的相当数量小说的真面目，奠定了此后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基础。

涉及本书选题的论著主要有阿英的《晚清文学报刊述略》(1958)、胡继武的《晚清时期的文艺报刊》(1983)、于淑敏的《论中国近代出版文化对近代小说的影响》(1990)、程华平的《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化与报刊业的作用》(1998)、陈大康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2002)、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2002)、郭浩帆的《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2003)、潘建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2005)等。阿英考察了1872年至1911年的24种文学报刊的办刊情况(列出了《小说时报》和《小说世界》等5种待访期刊),是我国早期文学报刊研究非常珍贵的成果。胡继武在阿英统计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并根据后来发现纠正了阿英统计上的一些漏误。于淑敏和程华平的研究涉及小说与出版业之间的关系,和本书选题是非常相近的,但是关乎小说传播的环节和现象的研究,仍有余地可寻。陈大康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和潘建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从目录学的角度梳理古代小说书目源流并探询古代小说的观念和文体变迁,是近年十分重要的成果,他们视野全面,未重点关注报刊小说。前辈学者的撰述博大精深,已建立了我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体系,势必传之久远。本书不揣浅陋,挖掘了一些晚清新兴公共媒体——报刊与小说传播的具体问题,诸如晚清小说与晚清报刊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小说在报刊上的传播是怎样操作的,报刊传播小说的量与质如何,小说因传播发生了哪些变化等。这些问题其实相当复杂,可能一时难以说透,还有待于我们及后人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书的主要观点和重点放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晚清报刊、晚清期刊、晚清文艺期刊、晚清小说专刊登载小说的数量统计及相互关系;二、晚清报刊登载与晚清小说繁荣的关系;三、晚清报刊登载对小说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四、晚清报刊在传播方面有什么样的方法和特点;五、晚清小说存在的缺陷和传播方式有什么关联;六、晚清小说在报刊传播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等。因晚清报刊浩如烟海,以个人之力无法进行全方位研究,故宁愿将口子开得小一些,主要研究晚清小说在期刊特别是以四大小说期刊为代表的文艺期刊传播的情况,或许可以管窥那个时代新媒体给中国传统文学带来的巨大变革,以及在其后较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延伸影响。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晚清小说生成的社会土壤	(1)
第一节 清政府改革引发小说创作的连锁反应	(4)
第二节 近代战争为战争小说提供了素材	(11)
第三节 西人办报对中国小说报刊的示范作用	(18)
第四节 晚清新知识阶层和自由思想的出现	(26)
第二章 晚清小说传播媒介的转变	(34)
第一节 晚清报刊业的崛起与发展	(34)
第二节 期刊的传播优势及晚清各类期刊纵览	(42)
第三节 晚清报刊的创办及其对小说的刊载	(50)
第三章 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的繁荣	(61)
第一节 晚清小说与报刊量的统计	(65)
第二节 晚清文艺期刊与小说的相互作用	(76)
第三节 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理论的盛行	(79)
第四章 晚清报刊对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影响(上)	(100)
第一节 晚清报刊与小说家的汇聚	(101)
第二节 作家—编辑—读者联系网的建立	(113)

第三节 读者群的下移与小说的市民化趋向	(118)
第五章 晚清报刊对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影响(下)	(126)
第一节 期刊连载对小说形式的影响	(126)
第二节 稿酬制对创作的影响	(140)
第三节 灵活的办刊手段和促销方式	(145)
第六章 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探究	(152)
第一节 晚清小说杂志的营销方式	(152)
第二节 晚清文艺期刊对小说的广告作用	(166)
第三节 晚清报刊作为小说载体的不足	(170)
第四节 办刊人的努力与正误	(189)
第七章 晚清报刊小说的现象探究	(196)
第一节 从《文明小史》看晚清职场生存法则	(196)
第二节 “四大谴责”小说的缘起和文内外纠葛	(210)
附录 1 晚清文艺期刊小说目	(225)
附表 2 晚清刊载过小说的期刊目	(268)
主要参考文献	(275)
后记	(282)

第一章 晚清小说生成的社会土壤

晚清小说在成就上虽不足以与中国最具影响的几部小说如《西游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但数量之巨是此前历朝历代均无可比拟的，而且晚清的小说在创作形式上亦突破了长篇章回小说的框架及存在的瓶颈，在作品的现实性、通俗性和多元化方面表现突出。小说林社的徐念慈曾经统计过1907年出版的小说计122本，阿英先生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至少在两千种以上”，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多方考据，参考了150多种资料，编著了两部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即《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小说数量共计16014种。国内外学者爬梳资料，亦有几种关于晚清小说书目的统计，均可发现晚清小说的创作较前有“爆炸式”的增长，因所处变革转型时代，对后世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故海内外学者对晚清小说空前繁荣的观点是一致认可的，但是对繁荣的原因却各执一词，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以下几家。

鲁迅先生在社会动荡和言论辖制的背景下完成了他的小说研究的力作——《中国小说史略》，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意义的小说史，其中研究了晚清小说特别是谴责小说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愆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

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①。鲁迅的这个结论是允当的，晚清之际，强敌悍然打进国门，政权动荡，民不聊生，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朝廷上下和普通百姓都积累了变革的诉求，且因无退路而更显坚决。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怀自强之志，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主张，表现在小说上，受国外政治小说曾发挥过巨大社会影响的事实启发，对本国小说也提出了承担启发民智、自强图新的历史要求，自然，大量“谴责小说”、“政治小说”、“时事小说”应运而生，实乃时代的要求。

阿英在自己的《晚清小说史》中集中探讨了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他的观点是：“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层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②。阿英的观点有和鲁迅共同之处，但他明确提出了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和小说繁荣的关系，由于技术上的改进，刊刻出版的成本降低了，普通老百姓读新闻、读小说成为可能；而且新型公共媒体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市场契机，这些关注新闻报纸的读者同样也是小说的读者，对小说的需求扩大也是空前的；阿英也正面评价了西洋报人在中国的引领示范作用，不管西人在中国办报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对国人办报起了积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欧阳健在他的《晚清小说史》引言中也评价了鲁迅先生“把眼光放于庚子（1900）以后，以为小说至此而‘特盛’，是很有见地的”。庚子国变对晚清当权者的触动是决定性的，其后社会各个领域因之发生巨变，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但是，欧阳健也指出此观点的不足，他说：“只是其时是否因为‘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顿有掊击之意’而导致小说创作繁荣，则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欧阳健注意到在晚清小说的繁荣景象背后，1901年至1903年非常特殊：“1903年的39部，几乎全是新型小说。也就是说，这一年的小说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确实确实有了一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个极大的飞跃。事实揭示我们：在1901年—1903年间，一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变发生，因而影响了小说自身演进的轨迹”。“那么，这个历史性事变是什么呢？就是清廷自1901年开始的改革。清廷的改革决心，可以说是以庚子国变‘巨额之代价’换来的。”^① 欧阳健观点的关键之处在于不认可鲁迅的所谓当时知识分子对清政府感到失望而倾力于写小说的看法，他认为恰恰是清政府的改革这个历史大事件对小说创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政体的改革和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否呈正比呢？有人认为不一定，因为我国在很多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改革并未直接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清以前小说在文学领域并不居领军地位，政治变革对史传、诗歌、散文乃至戏剧实际上产生过直接影响，如春秋战国纷乱与诸子学说、魏晋史事与文学风格形成、唐代社会变迁与古文运动等。所以到了晚清，小说的“合法”地位逐渐确立，这种影响又投射到小说身上，也是势在必然，欧阳健的看法应当是正确的，是对鲁迅、阿英观点的补充。

在晚清的最后二十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有资产阶级社会幻想的改良维新派们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却以失败告终，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知识分子认识到，既然图上层统治者不得，便可从图下层老百姓开始，在启发民众的各种实践中，以小说启发民众算是立竿见影的。另外，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一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仕途幻想，走上撰文为生的路子，自然也诞生了数量不少的小说家，并且不以小说为末技，着力于此，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清政府的集权统治能力已经度过“蜜月期”，实际上在乾隆朝之后已经走上下坡路，到晚清更是捉襟见肘，表现在舆论管制方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的情况对文化的发展却有一定好处，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的那部分人得以一定程度地“畅所欲言”，使小说较前更有批判性、现实性。再则，西方人用我们不情愿的方式打开我国大门，劫掠我们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思想，这些思想以及衍生的生活方式中不乏积极的部分，晚清当时的一些思想新潮

^①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的“公知”得风气之先，从事新小说的提倡和创作来宣扬这种思想。就传播的层面来说，阿英和很多学者认识到，是中国出版业的兴盛，为小说尤其是报刊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科技含量较高”的平台，直接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和繁荣。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晚清小说的创作，从作家、作品、读者、素材和传播方式等方面都渐趋成熟，晚清小说之繁荣成为必然趋势。小说的繁荣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投影，我们必须看到，此一时期繁荣的不仅是小说，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千年封建王朝向现代中国社会过渡的一个桥梁，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巨大的。

第一节 清政府改革引发小说创作的连锁反应

现在有的中学生把中国近代史戏称为“中国窝囊史”，这一说法道出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的实际境况，当国人沉睡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伟大基业上，在四大发明帝都大国的幻觉上沾沾自喜时，其实已变成任强国宰割的肥而孱弱的羔羊，坠入覆国亡民的危险。不过，这种看法也有些绝对，因为学生们的认识更多地烙印了负面的印象，产生了国家在这个时期一败涂地的错觉。这也能够理解，他们毕竟并没有亲历过当时的实际生活，史料的信息又掌握不全，故不容易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对于在动荡中萌生的足以影响后世的积极因素，就更知之甚少了。

一 19世纪积弱挨打的中国

实际上19世纪初国势已经显现出不祥的征兆。例如漕运、盐务、货币等领域，频频出现严重混乱的情况，清政府官员在其中大敛其财，严重侵蚀着国家的支柱。苗民、三合会及白莲教起义等民间反抗运动此起彼伏，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却给当时的清王朝两个致命打击：其一，正规清军得不到地方缙绅和雇佣军的支持，镇压不住地方的叛乱，更无力面对后来的鸦片战争；其二，在对内乱的平定过程中，国家积累的财富遭到过度的透支。“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

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①。

19 世纪上半叶，就在我们混乱不堪、自大内耗的时候，英、法、意、德和美国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划时代的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迅速提高了国家生产力，财富迅速积累，经济快速发展。就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文明思想和民主政治亦得以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家为了进一步夺取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把贪婪的目光瞄向了亚洲。

强敌当前，弱国无外交。当经济纠纷、宗教纠纷升级为战争较量的时候，我们只能傻眼。血肉之躯、画符迷信和冷兵器如何抵挡得了洋枪洋炮？所谓八旗兵、绿营兵并非不想打胜仗，所谓他们都是从烟榻上爬起来上战场的说法有些夸张，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实际上是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落后于别人。即便是打了半个世纪立下赫赫战功的湘军和后来的淮军面对列强也是一筹莫展。人们曾盛赞过湘军“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但是军事装备不强，后勤保障不足，“硬件”上不如人是没有办法的。1840 年到 1895 年的 55 年间，中国接连吃了一系列败仗，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数个不平等条约，剥夺中国利益，侵犯中国主权。

在这段时间内，清王朝有过短暂的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是指 1854 年至 1868 年这 14 年，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末重臣的努力，国势暂时稳定，上下致力于发展实业，国家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政体也恢复了稳定状态（虽然是表面的）。已故的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芮玛丽曾这样评价“中兴”的含义：“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② 清政府在对外妥协之后获得暂时的平静，“图强”、“自强”的概念被反复提及，军事技术上接受了英、俄、法国有条件的帮助，开始训练新兵，使用新式滑膛枪装备了小部分官兵，

^①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4 页。

^②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18 页。

这些做法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愿景接近，这种上下同声的自强呼声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总理衙门一开始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后来成了洋务运动的枢纽机构，涉及领域包括了外交、外贸、学堂、开矿、造船、兵工、军队训练等，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的设立，同文堂的设立和选派少年出国深造的计划在军事和经济文化的未来发展上都有进步意义，可惜愿景虽好，时机已过，且经费不足，官员贪腐依旧，杯水救不了急火。

二 清末社会的改革运动

到了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想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接受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的改革意见，在现在看来，这个方案其实已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既得利益者的部分，可惜权贵们没有透彻感悟国家的危险，而且不满于朝廷对他们有限的保护。这些改革意见还是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是埋伏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中的“双料间谍”，由于他的伺机告密，慈禧太后果断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抓，康有为、梁启超等外逃，六君子被杀，清政府在遭受灭顶之灾前作了最后一次可能的挣扎，摆在面前的是失败的命运。

不管愿不愿意，1900年还是到了，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破曾经富庶华丽的北京城，大肆烧杀抢掠，生命、财产和文化遭受浩劫。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慌忙逃往西安，帝、后的逃亡引发举国恐慌，该事件史称“庚子国变”。梁启超曾痛彻心扉地说：“庚子八月，十国联军，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沉，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者也。”^①

庚子国变，可谓奇耻大辱，变革可能死，不变革肯定死，痛定思痛，清政府决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这次改革采取的行动很有意思，大部分和戊戌变法者提出的方案相似，有的措施力度更大，走得更远。

^①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主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1901年全编第一册。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以光绪名义发布了一道决心变法的上谕^①：

丁未。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牒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这个上谕的措辞和决心之大前所少见，不仅指出此前的各种改良行动仅在语言文字和制造器械，是皮毛之举，而决心在“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各方面进行彻底的大变革，其理想已经超出了此前维新派的力度，走得更远。只要有这样的态度，无论起因如何，对于一个古老国家的兴盛来说是好的，是趋向进步的，虽然迟了点，仍表示了和已经超前发展的国际社会接轨的愿望。所以费正清先生的《剑桥中国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5—136页（总第4601—4602页）。

晚清史》中客观地认为“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①，这种改革来得太迟，但毕竟开始改革了，这次改革包括废除科举、创办新学、奖励留学、装备新军、修建铁路、开发矿藏、发展实业、改革法制、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覆盖了晚清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揭开了由封建专制转向现代社会体制的序幕。史料向我们展示，隋唐以来的科举选才制度被废止了，新式学堂在各省办起来了，国家花费数百万银两送少年才俊出国留学，新式军队和新式武器开始装备，以前谈虎色变不让外国人插手的铁路、矿业也逐步启动，连立宪政治也提上了桌面。可以这样说，涉及一个社会架构的所有领域都在这次改革的议题之内，这样的阵仗，不管能否落实下去，都为古老中国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迈出了蹒跚一步。可惜的是，清王朝的改革是摇摆不定的，带有投机性质的，一次又一次地让民众失望，加之本身体制和人脉的积弊太深，尾大难掉，已经没有人愿意再给统治者们的时间慢慢治疗满身的创伤，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来说，没有更好的路可走了，等待的只是辛亥革命的致命一击。

虽然我们作为后代不应嘲笑先辈们在改革中表现出的窘态，但是晚清的中国社会确实表现出“轻度精神分裂”的状态。一切新的文明都夹杂着旧的因素，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样子。在任何领域都活跃着维新派和保守派，还有很多“半新不旧”派，他们似墙头草一般摇摆不定。希望政治改革不触动权贵的既得利益者，只能是空谈；一些人天天跟着喊“立宪”，却实在不知立宪的实质是什么；新式学堂难以觅到合格的教师，充斥着有一半有传统功名却不了解新式教育的老师；皇帝派遣的新军官出国学习为保护朝廷，却在那里学了满脑子革命思想，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新官员走马上任欲燃“三把火”，把持实权的却仍是身份低微的胥吏……林林总总，尽是怪相，实乃末世之兆，李伯元在《文明小史》里生动地描写了社会群像，人们“上头要行新政，就说新政的话，要招义和团，就说招

^①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3页。

义和团的话”(第二十四回),一旦风向改变,马上改头换面。欧阳钜元在他的《负曝闲谈》中也塑造了同样举棋不定似新非新的“新党”人物。

三 文学改良与时代变革

面对列强凌辱的灾难,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老百姓都在反思,都在寻找富民强国之路,有喊革命的,有喊立宪的,有喊学习西方技术的,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为首的维新派作家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更具体地力图借小说的作用来实现救民救国的理想。

文学的改良运动在晚清发生可谓恰逢其时,因为社会面貌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人生大戏天天都在上演,民众挟裹其中,油然而生政治热情,都萌生了一种了解和参与社会的渴望。“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口号,希望建立新的文学形式引领和适应新的时代气息。

在文学的这四种样式中,诗、文乃风花雪月雅人之事,戏剧的最终形式是表演,姿态最低和民众最接近的就数小说了。纷繁变化的社会时事为作家们提供了现成的创作素材,不记下来着实可惜;想了解的人又很多;大部分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有限;清政府内外交困放松文网,小说就很好地衔接了这四方面的因素。想必此时的小说家们,内心也相当纠结,他们目睹了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痛心于黑暗和腐朽的社会问题,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公知”,他们在作品中谴责贪官、谴责清官、谴责朝廷,谴责一切看不惯的。但是,当时的作家们内心的痛苦是最主要的,因而思考是最本质的,他们不能一味地谴责、宣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贵的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清政府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期待和思考。

李伯元宽容地表达了他对晚清改革的期待和理解,认为只要改总是好的,吴趼人也基本是这个态度。